



2020年10月25日

星期日

中共衡阳市委机关报

# 文化周刊

CULTURE WEEKLY

衡阳日报  
HENG YANG DAILY

今日四版 农历庚子年九月初九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4 第 17625 号  
衡阳日报社出版

衡阳史话之文化篇 14

## 蜚声华夏的书院文化(三)

### 湛若水情系衡州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一位年逾九旬的老翁,远足衡岳。他童颜皓首,头顶炎炎烈日,缓缓前行在南岳山的山道上。

登山途中,路人见此长者,认为神仙。长者手拂长髯,赋诗一首:“翁年九十一,问翁何远出?新定禹山居,安土不自逸。胡为凌风波?恐干蛟龙窜。答谢文老燕,人生贵适适。丈夫志六合,怀土非所恤。我屋衡山上,天柱紫云郁。十年未返庐,多负此云物。策杖念朋怀,乐与话句月。广大兼精微,合同归默契。”(《南岳志·甘泉书院诗录》)诗中怀旧之情跃然而出,这位不忘衡岳故情的老人就是明代著名理学家湛若水。

湛若水先后三次游历南岳,在他30岁时,就想游南岳,但直到晚年,才如愿以偿。第一次游南岳是在辞官后的第一年,他时年已72岁;第二次是年届80岁;第三次是91岁时,寿翁游南岳,其乐无穷。李元度《南度志·前献》记述了湛若水“九十一复游衡,舟泊石鼓,题诗讲堂壁间,再登南岳,栖迟凡数月。庞眉皓首,步履如飞,望之若仙人云”。

但湛若水最后一次游衡岳,讲学实为其主要目的。湛若水是广东增城县甘泉都人,与衡阳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对他南岳心仪已久,看中了紫云峰下一片风光独秀之地。此处群山环绕,清溪涓流,后山青松翠竹,曲径通幽,幽深处有迷人的紫云洞。如此清静优美的环境,正是读书讲学的好地方。当年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选中此处,创办文定书院。湛若水决意步文定先生后尘,以先贤为榜样,青山为伴,智者乐水。他在南岳紫云峰下建甘泉精舍(后改为甘泉书院),讲学其间;又在南岳修建白沙书院以纪念他的老师陈献章;他先后数次到石鼓书院讲学,高扬心学旗帜,湖湘学子慕名而至,极大地推动了心学对理学的变革。

湛若水之所以对南岳和石鼓情有独钟,主要原因还是南岳和石鼓书院是他心目中传播和研究理学的圣地。湛若水是一位活了95岁的高寿理学大师。40岁才中进士,在官场平步青云,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转吏部、兵部尚书,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年)75岁时才告老还乡。湛若水与王阳明一样,既为官又为学,用王阳明的话说,他们“共以倡明圣学为事”。(《王文成公年谱》)

这个“圣学”当然是孔孟儒学。儒学在宋时为理学,在明时为心学。历代儒学大师都以各自的方法和心得“倡明圣学”。因此,儒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湛若水和王阳明是以心学的方式“倡明圣学”。

湛若水从44岁开始讲学,一直到去世,历时50余年。南岳和石鼓书院是他“倡明圣学”的重要之地,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情结。

湛若水仰慕南岳这片“文明奥区”,筑室紫云峰下,创建了甘泉书院。明代蒋信在《甘泉精舍记》中记述了湛若水由广东来衡,建甘泉书院的过程:“遂自罗浮携门人……由西樵山攀舟而行,不访其家,亦不谋诸人,所过自僦民舟,不令官府知之。逾乐昌而郴,舟仅容身,从者多病。居之裕如也,将观祝融之朝日,一望紫云即指曰:钟秀之区,无过于此,不可以终吾老乎?讯之道士,始知为无主庶观址焉,约十余亩。遂计其值,买诸官,乃募、乃辟、乃构、乃筑堂舍、门槛,逾月而次第告成,讲堂五间、寝室三间、外大门一间、二门三间、垣墙周遭。”

湛若水带着弟子们悄然动身,租一小舟自乐昌而及郴州,再从郴州入衡。舟小仅可容身,弟子经不住一路辛苦,纷纷病倒,但湛若水并不觉得旅途辛苦,因为南岳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终老”之地。到南岳后他选中了紫云峰下一片荒芜了的道观旧址,用个多月时间在“废观址”(衡岳观)上建成甘泉书院。从书院初建的规模看,算是不小,讲堂就有五间。可见当时湛若水办学心切,传递情笃。湛若水移居南岳创办甘泉书院,志在理学昌盛之地,再开理学新景观。湛若水居留南岳时间只有几个月,但他却在理学的继承上,为南岳抹上一笔浓厚的文化光彩。他告老还乡后,念念不忘的还是南岳这座文化名山,91岁的湛若水再游南岳,虽然“安土”故里,但他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忘不了梦回绕的南岳,是南岳让他感悟到文化的广大与精微,领略到宇宙人生的情趣与天然。仁者乐山,乐山的湛若水乐在南岳文明无限意蕴之中。

衡州人为纪念这位“倡明圣学”的先贤,为其塑像,并立碑刻上他的代表作《心性图说》。若水是陈献章的弟子,又与心学大师王阳明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陈献章与王阳明在变革明代理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学在宋代为程朱之学所垄断,宋初理学的鲜活生命力发展到明初已成死水一潭,学术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陈献章却敢于挑战权威,以开放的学风冲破这种思想僵化的局面。

陈献章为学主张一个“疑”字。他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陈献章《与张廷实主事》,《陈献章集》卷二)陈献章“学贵知疑”的为学之道,对湛若水影响颇大。

湛若水在弘治七年(1494年)从师陈献章。时间不

长,但对老师“学贵知疑”的主张心领神会,并把这种“疑以为学”的江门学风发扬光大。湛若水承继师道说:“或问学何贵?甘泉子曰:学贵疑,疑思辨,辨思得矣。故学也者,觉此者也。”“夫学而知所疑也,学之进也。如行路然,行而后见多歧,见多歧而后择所从,知择所从者,进平行者也。”(《甘泉文集》卷三,湛若水《雍语》)湛若水承传陈献章思想,强调治学以贵疑、重思来寻求自得。

一个有趣的事是,陈献章没有到过南岳,但他却对南岳情有独钟,陈献章连做梦都想到南岳“道遥游”,他写有《梦游衡山》一诗,诗云:“衡岳去天能几何?一株松下月明多。南极老仙骑鹿过,一瓢器月两岩歌。”

他还写有《忆衡山》,诗云:“曲何处枕湘流,不到名山死不休。高咏祝融峰顶月,与君当作道游。”陈献章有“不到名山死不休”的心愿,但他夙愿未了,却早仙逝。但他的高足湛若水却替先师了却这桩夙愿,还在紫云峰修建白沙书院以纪念恩师。王阳明对名山大川也是别有一志。早年他官场遭贬,却在深山得意,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他被贬贵州龙场驿,深山老林之中,终日苦思冥想,一日夜,灵感突发,“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

明代中叶,以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可以视为儒学的又革命。所谓“心学”,就是以主体之“心”作为宇宙世界的本体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至空前的地位。明代“心学”的主要代表是王阳明、陈献章与湛若水。黄宗羲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即陈献章,阳明即王阳明),为明代心学的主流。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不对,但黄宗羲却忽略了湛若水在陈、王二人中间的重要地位。湛若水是陈献章的高足,又是王阳明同志道合的学友。陈献章开创江门学派,标新于程朱理学,湛若水于弘治七年(1494年)从学于江门,为陈献章所赏识。湛若水从师不久,陈献章便病逝。湛若水在恩师辞世后,发奋读书,走上科举之路,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编修。正德元年(1506年)在京师相识王阳明。王阳明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及第,在京师任过刑部主事,兵部主事,但他亦官亦文,就在湛若水进京那年开始“授徒讲学”。这一年王阳明34岁,湛若水年长王6岁,俩人初识后很快“一见定交”成为好友。

### 王湛两人的学术差异

湛若水和王阳明两人初识时,湛若水在学术上满腹经纶,时有高见,提出有名的“随处体认天理”说。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还未完全成熟,对有明确学术追求和主张的湛若水甚为钦佩,大有相见恨晚之故。王阳明说:“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并有一见如故之感,“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院庶吉士,一见定交,其以倡明圣学为事”(《王文定公年谱》)。这说明湛、王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在结识湛若水的第二年,王阳明因得罪权太监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湛若水以诗相赠:“自我初识君,道以日与寻。一身当三益,誓死以同襟。”(湛若水《惜别诗》)可见王湛二人交情至深。

王阳明的思想接近陈献章,但王阳明本人却从未见过陈献章,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心学之脉是通过湛若水来传承的。王阳明在正德七年(1512年)写了一篇《别湛甘泉序》,认为湛对自己影响颇大。他说:“晚得友于甘泉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用遇,则予以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何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与?”王阳明承认湛若水的“自得”之学,让他受益匪浅。

所谓“自得”之学,就是为学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学贵知疑,自主思辨,独立思考,不盲以圣贤之书。这种贵疑、贵思的“自得”之学促使湛若水与王阳明开拓出了心学发展的新天地。由于王阳明与湛若水共同致力于心学的发展,所以学者又称之为王湛之学。

王湛之学把“心”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以“心体万物”阐扬了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把握。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力主“致良知”;湛若水认为“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莫乎天地万物之中者也”,力主“心体万物”,随处体验天理。当然,王湛两人的心学差异也是很大的,王阳明是纯粹的心学,湛若水是心学向理学的过渡。这种同中见异的差异正如张栻与朱熹的差异一样,正因为这种差异性,呈现了心学发展的勃然生机,学者也趋之若鹜,“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黄宗《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宋代的湖湘学派为理学发展的一大奇观,明代的王湛之学对理学发展进行了一次革命。湖湘学派发轫于南岳,轰鸣在三湘四水;王湛之学却以石鼓书院为重镇,瞩目于天下。湛若水先后5次到石鼓书院讲学,以他的“心体万物”的“自得”思想哺育无数莘莘学子。即使是在晚年,湛若水还是忘不了衡州那片文土,他在91岁高龄时,还到南岳游览,感受生命余光中山色水秀。王阳明虽然没有亲历衡阳讲学,但

他的弟子邹守益慕名前来阐述“致良知”的思想。王湛之学成为明代中叶石鼓书院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王湛之学”是明代中叶的盛学。学者之所以用“王湛之学”统称阳明学派(王学)和甘泉学派(湛学),是因为两者同属于“心学”的大范围,也就是说王学和湛学在心学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着相同的主张和见解。但是“王湛之学”又有区别,王学是有别于程朱理学的纯粹的心学,是以心为本体;湛学不同于王学,而是吸收了宋代理学一些思想,以天理为最高本体。湛若水也讲“心体万物”,但他不同意王阳明无限地夸大主观之心作用,以绝对之心去主宰天地万物,而是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因此湛学既有王学的心学色彩,又有程朱理学的影响。由此而言,湛学是折衷了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一个学派。所以黄宗羲分析明代学派传承时,言及了两派各有学术宗旨又相互影响的关系。黄宗羲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七)

湛学是指以湛若水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及其思想。湛若水一生讲学50余载,其门徒弟子数以百计,其学堪与王学比肩,是明代中叶的显学。湛若水通过讲学和撰著,阐述了这样一些主要学术观点“心性非二”是湛若水在哲学本体论最基本的命题。他说:“性者,天地万物的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不二也,譬之谷也,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侧隐着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现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甘泉文集》卷二十一,《心性图说》)

湛若水这一段话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即心与性不是两种东西,心、性实为一体,是万事万物所内出的本体。这样湛若水巧妙地把王学“心即理”与程朱的“性即理”沟通在心性一体之中。心、性虽为一体,但心、性还是有差别的,性是天地万物之体,是心之生理;心则包容万物,心还可以包容性在内,因而心的范围是比性还要大的本体。由此可见,湛若水看到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有偏执一理的倾向,他提心性合一来折中陆王与程朱之学,走出了由心学向理学过渡的独特学术道路。

在心性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主张“随处体认天理”。这是湛学与王学又一区别之处。王阳明主张“致良知”,即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发明本心,即可心通天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传习录》中)。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不以为然,他说:“良知二字,自孟子发之,岂不欲学者言之?但学者往往徒以言,又言得别了,皆说心知是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知得非便去到底。如此是致,恐师心自用,还须学问思辨笃行,乃为致善。”(《明儒学案》卷三十七)

湛若水也认为人要有“良知”,但不赞同王阳明以“心知”为良知,这样会无限夸大本心之知,是师心自用。他主张“致良知”,不仅要发挥“心知”作用,还要与“学问思辨笃行”并进与王阳明不同的是,湛若水把良知(良心)解释为人的“初心”,认为良知只是内心的发端,是人的初念发动,人之“初心”虽然包含善念,但还需要不断“涵养扩充”,才能知是知非,如果良知先天就知道是非,“而途中童子皆能,岂不害道?”(《甘泉文集》卷七,《答洪峻之侍御》)

很显然湛若水把立足点从体认本心变成体认天理,反对先天主观性“致良知”,主张通过“学问思辨笃行”来“致良知”。在湛若水看来,人心“涵养扩充”的过程又是不断体认天理的过程,他说:“博学、审问、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酢,随时随处皆随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甘泉文集》卷七,《答洪明》)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他明显有别于王阳明发明本心“致良知”的主观内心活动,带有明显的客观践行行为,兼备了主客观双重属性。所以说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是内求之于心,外扩充于行的主客观双向“体认”,“体认天理”既是体认此心,又是践行天理,这种双向“体认”既是对程朱理、性的认同,又是对陆王心、良知的发挥。

湛若水就如何为学对自己的学生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自后世儒者皆坐支离之弊,分内外本末心事为两途,便是支而离之。故有是非内外、重心略事之弊。犹多不悟,反以为立本。千百年来,道学不明,坐此之故。自今诸学子合下便要内外本末理合一,乃是孔孟正道。何者,理无内外本末心事之间也。”(《甘泉文集》卷六,《大科训规》)湛若水批评千百年来儒学传承存在“支离之弊”,各取一端,自以为是,要取“孔孟正脉”,必须“体用一原”“一以贯之”。在这里,湛若水提出以“合”的方法来传承孔孟儒学。其实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也正是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以补程朱与陆王之偏,实现理学与心学的包容性统一。

(本报记者胡建军、实习生刘铭婵根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文化史论》编辑整理)



陈献章 像



王阳明 像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